

BAIHUA
PROSE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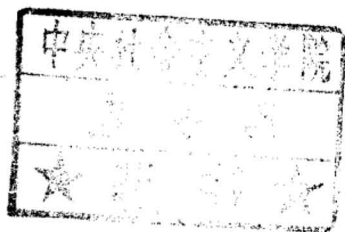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叶圣陶散文选集





200304973



79779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叶圣陶散文选集

朱文华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朱文华 (1)
吾人近今的觉悟	(24)
侮辱人们的人	(25)
生活	(28)
对鹦鹉的箴言	(32)
诗的泉源	(34)
读者的话	(39)
没有秋虫的地方	(42)
藕与莼菜	(44)
将离	(47)
客语	(51)
丛墓似的人间	(57)
《天鹅》序	(61)
读书	(63)
“双双的脚步”	(67)
一件烂棉袄	(71)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73)
暮	(77)

记佩弦来沪·····	(81)
别人的话·····	(86)
致死伤的同胞·····	(90)
莫遗忘·····	(92)
《光明》第一期编辑余言·····	(95)
腐烂了玷污了的·····	(97)
愤愤·····	(101)
“怎么能……”·····	(102)
白采·····	(105)
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	(108)
两法师·····	(110)
《未厌集》前言·····	(118)
关于《幻灭》《动摇》《追求》·····	(119)
《倪焕之》作者自记·····	(120)
致施蛰存·····	(122)
过去随谈·····	(123)
牵牛花·····	(131)
闻警·····	(133)
“今天天气好啊!”·····	(136)
“文明利器”·····	(138)
看月·····	(141)
读经·····	(143)
说书·····	(146)
昆曲·····	(150)
三种船·····	(154)
天井里的种桂·····	(164)

几种赠品	(169)
记游洞庭西山	(173)
勒令转学	(178)
报销主义	(182)
《二十五史补编》刊行缘起	(187)
骑马	(190)
书桌	(195)
生命和小皮箱	(202)
嘉沪通信 (第十九号)	(204)
蓉渝往返日记 (1944年9月25日)	(208)
知识分子	(210)
以画为喻	(215)
血和花	(219)
谈成都的树木	(222)
“算了, 算了”的态度要不得	(225)
诗人节致辞	(228)
出川日记 (1946年1月9日)	(231)
我坐了木船	(233)
驾长	(236)
答丐翁	(239)
橈夫子	(242)
又来挽《民主》	(245)
牛	(247)
济之先生逝世	(250)
北上日记 (1943年3月1日)	(253)
佩弦周年祭	(255)

序 言

朱 文 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圣陶（1894—1988）是以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而赢得声誉的。然而，叶圣陶在创作上本是多面手，并富有驾驭各种艺术样式的才能。他的散文创作，也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独树一帜，并且多有名篇。

叶圣陶的现代散文创作，曾结集出版过《剑鞘》（1924）、《脚步集》（1931）、《未厌居习作》（1935）和《西川集》（1945）等多本集子，此外还有散见于各报刊的政论、杂文，小品，随笔和信札等数百篇，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有目共睹的。郁达夫在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时曾收录叶圣陶散文5篇（入选篇目仅次于周作人、鲁迅和朱自清），而阿英在同年出版的《现代十六家小品》中，如同郁达夫一样，也对叶圣陶的散文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叶圣陶，1894年（光绪二十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原名绍钧，字秉臣，一生有郢生等笔名四十余个，但以圣

陶之名而著名于世。叶圣陶六岁时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至十二岁时，改入新式的高等小学，次年考入苏州一中。在这前后，他因受上海报章杂志的影响，开始萌发了文学兴趣，并且从1911年7月起向上海报刊投稿。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而无力升学，先是任小学教员，继而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这前后到1918年，他还与上海的《小说丛报》和《礼拜六》等杂志发生联系，为之撰写文言小说近20篇。由于叶圣陶出身清寒，且又能比较正视现实，所以这些最初的作品就能在某种程度上揭露社会黑暗面，并表同情于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与当时那些逃避现实而乐道声色犬马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有着一定的区别。正因为这样，叶圣陶也能够迅速拥抱“五四”新文化运动，毅然突破旧文学的藩篱而坚定地步入“五四”新文学阵营。

叶圣陶的新文学运动始于1918年秋冬，自1919年元旦始，就在北大《新潮》杂志和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言论以及白话小说和白话新诗。因其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批作家在创作上的成绩，还破例地以非北大学生的身份加入了著名的“新潮社”。至1921年，因同样原因，他又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发起人之一。稍后几年中，叶圣陶在继续新文学创作的同时，还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便利，承担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组织工作，如除了负责文学研究会的日常事务外，还参与编辑《文学旬刊》（后易名《文学》和《文学周报》），并在长时间内任主编。

叶圣陶新文学活动的第一阶段似可断在1925年“五

卅”运动前夜。在这阶段，他的创作除小说外，新诗代表作被收入《雪朝》（八人集，1922），话剧作品有《愚亲会》、《艺术的生活》和《风浪》三部（1921），童话则结集于《稻草人》（1923），而散文作品更多，除了12篇记事抒情的小品文收入《剑鞘》（与俞平伯合集，1924）之外，未入集的还有政论、专论、杂文，速写、书评、信札和文艺短论等，共130余篇。由此可见，在该阶段，叶圣陶的散文创作成绩至少是与小说创作相一致的。还值得注意的是，叶圣陶在1921年3—6月间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一组以《文艺谈》为总题的文艺短论共40篇。就它们的内容而言，相当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若干文学原理和文学技巧问题，而在形式上本身又是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语言流畅，文字朴实。这表明，叶圣陶第一阶段的新文学活动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文艺理论思索，这种思索势必影响他在后几个阶段包括散文创作在内的文学活动。

叶圣陶新文学活动的第二阶段，自1925年“五卅”运动到1937年底抗战之初由沪入川前夜。叶圣陶在这一阶段的基本职业，1930年前仍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其中1927—1929年间又一度代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而1930年以来则改在开明书店从事编辑工作，主编《中学生》杂志等。如果说叶圣陶在投身新文化运动前曾经有过明显的政治活动的热情（如1912年间曾加入过“中国社会党”），而在从事新文学运动第一阶段中，改为信奉并实践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即主要以扎实的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①那么在本阶段里，他的政治活动的热情再度高涨了，如“五卅”运动中参与创办

《公理日报》以支持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又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中共外围组织）并负责创办该会机关报《光明》半月刊；1927年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也积极参加当时的临时革命政权组织（即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而在“9·18”以来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又积极参加上海进步文艺界的抗日团体的有关活动。应该说，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叶圣陶的思想深受时代激流的冲击而更加重视现实的救亡运动的重要性了。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他本阶段的文学活动上：

当时，叶圣陶作为文学编辑家，独具慧眼地发现并毅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茅盾，丁玲和巴金等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为小说家，自己也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形象地否定“五四”以来的“教育救国”一类改良主义思潮，而提出了只有变革整个社会制度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出路的思想主题；而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也开始摆脱前一阶段着重描绘卑琐灰色人生的情况，从而刻划了一些敢于与社会恶势力作斗争的革命者形象。同样，作为散文作家，叶圣陶本阶段的创作，较之前一阶段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内容题材上针砭人生、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作品更多，批判力度也大大加深，典型的如写于“五卅”运动中的以《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为代表的一组散文。至于本阶段出版的散文集《脚步集》（1931）和

① 叶圣陶在1923年间曾婉谢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叶圣陶：《纪念杨贤江先生》，《人民日报》，1949年8月9日。此事系从商金林编《叶圣陶年谱》，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

《未厌居习作》（1935），乍看似乎没有很激进的文字，其实，像《“怎么能……”》和《“文明利器”》等篇，如同未入集的《勒令转学》和《报销主义》等篇一样，对于当时的反动思潮和国民党当局的包括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内的内外反动政策，都有深刻的抨击。

从1937年底到1949年是叶圣陶新文学生涯的第三阶段。这期间，他先是随上海开明书店举家入川，辗转重庆、乐山和成都等地，至抗战胜利后才由川返沪。居川时期，叶圣陶在专职工作之外，还在内迁的武汉大学和光华大学等校兼课，同时又积极参加大后方的抗日文化工作，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主席团委员，又任《抗战文艺》编辑会委员。当时，叶圣陶的创作力仍很旺盛，除了继续写小说外，散文创作也甚勤。这时期的主要散文作品，部分收入了《西川集》（1945），其余散见于当时大后方的报刊，直到几年前才集入《我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其中名篇有《以画为喻》和《生命和小皮箱》等。返居上海以来，叶圣陶又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也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散文作品，如《又来挽〈民主〉》、《答丐翁》、《济之先生逝世》和《佩弦周年祭》等，只是这些作品在长时间里没有结集。

另外，在这一阶段中，叶圣陶还曾写有《渝沪通信》、《嘉沪通信》、《蓉桂往返日记》、《蓉渝往返日记》、《出川日记》和《北上日记》等，^①其中若干书信，当时

① 前五种日记、书信，后收入《我与四川》，《出川日记》和《北上日记》后收入《日记三抄》（花城出版社，1982年1月）《出川日记》又易题为《东归江行日记》。

就被友人发表，因其文笔隽永，情思毕露，也很受读者欢迎。

叶圣陶的新文学生涯的第四个阶段，是自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他以高寿谢世的四十年间。“文革”之前，叶圣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语文部主任等社会公职，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叶圣陶仍然笔耕不辍，散文创作方面即有脍炙人口的《小记十篇》（1958）等。另外，叶圣陶还写了许多有关语文学习问题的通信，这些信稿连同他在解放前的类似文章，后来都收入《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下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10月），也可以视作为他的另一类散文作品。而在“文革”结束后，叶圣陶虽已年逾八十，再次拿起搁置多年的笔。这时期他除了写下一批情深意切的悼念亡友的文章或为友人们的著述作序跋外，曾在《文汇报》辟《晴窗随笔》专栏，前后撰文凡十四篇，一时传为美谈，还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初，叶圣陶在其子叶至善、叶至诚兄弟的协助下编选了《叶圣陶散文甲集》和《叶圣陶散文乙集》，两书共收入叶圣陶在六七十年创作生涯中写下的散文作品430余篇，而其中收入《甲集》的200余篇，叶圣陶大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这表明叶圣陶在创作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可贵精神。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像叶圣陶那样笔耕七十年的情况，本是不多见的，而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叶圣陶的散文作品又远远超过他的享有盛名的小说。

当然，决定叶圣陶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地位和影响的，更在于他的散文作品在内容题材和艺术形式的结合上，有着独特的风貌。

由于本书编选的是叶圣陶在1949年以前的散文创作，所以单就这一历史时期而论，叶圣陶至少有下列五类作品是令人称绝的，也就是说，正是这几类作品，其显著的特色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优秀成果。

一是内容题材上以针砭人生、批评时政为主，与此相适应，语言笔调以议论性为主，但行文却不拘一格，富于变化，可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很类似于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通常意义上的“杂文”。

试看《又来挽〈民主〉》。该文开篇的几句话是：

刚挽过《周报》，现在又来挽《民主》，悲愤极了。

在《周报》被迫停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必然也容不得《民主》。我们知道，隔不多久，《民主》也将使用那刺人眼睛的三个字——“休刊号”。

准备着挨的一刀，刺过来觉得更痛。何况我们已经屡次被刺过了一刀。

当然，多刺一刀，我们痛得更利害。可是，多刺一刀，也使我们恨得更深切。

短短的几行，记录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更揭示了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最普遍也最深切的感受。而读者又自然能够领悟到，文中“民主”一词不只是

专指一家刊物，其另一涵义又是泛指中国人民的政治追求。这样，从题目到本文，“又来挽”三个字一用，境界迭出，潜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沉痛悲愤的情思，无疑是凝结了一段历史的教训。

在这类作品中，最足以构成“五四”散文名篇的，当然首推《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该文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抒写作者在“五卅”惨案次日去南京路“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过程中的见闻与感受。那些血迹“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的场景，已使作者感慨不已，而荷枪巡捕的狞笑面目，在店铺里号召反抗斗争的“露胸朋友”（劳动者）的警句，以及“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的人的猥琐形象，更使作者体验了另一种政治情感。总之，“五卅”惨案次日的那场急雨中的情景，带给了作者强烈的感受，而作者要向读者表达的，也正是一种团结斗争的民族精神：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二是在内容上以写景状物、记人叙事为主，但在表现形式上抒情色彩浓厚，由此可以视之为狭义的“散文”。典型的如《没有秋虫的地方》，《藕与莼菜》、《牵牛花》、《看月》和《天井里的种植》等，以及那些怀念友人的篇什。

需要指出的是，叶圣陶的这类作品，有些虽然从内容题材看，所采撷的似是“身边琐事”，或者是表现养花种草和赏玩风月之类的闲情逸致，而没有明显积极的思想意义。其实不然，这是因为，首先，小题材写大问题，即所谓“一颗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本是散文创作的惯伎，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①不独叶圣陶，鲁迅（如《风筝》）、郭沫若（如《小品六章》），朱自清（如《荷塘月色》）和许地山（如《落花生》）等也是这样。叶圣陶的这类作品，其感情基调不仅是积极健康的，而且在谈花草风月时又巧妙地融合了相当深刻的社会内容。且以《天井里的种植》一文为例，诚如有的研究者已经正确分析指出的那样：作品写道，在自己种植的花卉遭炮火摧残后，一度不想再操持此事，但终究还是再次种下绿蓬蓬的杨树和丛丛花卉，在这里，作品把人的心境，花木的命运与时代的风雨有机地交织在了一起。其中，既控诉了恶势力对美好事物的破坏，又写出了作者在危难困顿中对美好事物的执著的追求和在这种追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乐观向上的精神，再联系到当时的社会形势，显然就不能把这类作品看作为作者只是在谈论养花种草和赏玩风月一类的琐事闲情了。②

至于这类作品中的怀念友人之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着相当完美的结合。如《白采》和《答丐翁》，分别悼念两位刚逝去的友人，情深意切，哀婉动人，又把深切的悼亡情思与对亡友的文章道德的切实评价融为一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② 金梅：《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

体。尤其是《佩弦周年祭》，该文前三节的起句分别设问：佩弦，你为什么不死半年（八个月、十年二十年）？而在相应的段落中，则对亡友的思想、学问、才气、精神风貌乃至学术地位作了简洁、形象而又公允的揭示，其中包涵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思想主题，既丰富又深刻。朱自清先生逝世后，他的友人们所写的悼念文章不胜枚举，但相比之下，却数此篇写得最为感人至深。如文章的最后一节是：

佩弦，我到了你清华寓所的书房里。嫂夫人说所有陈设一点几没有动。我登门不遇永不回来的主人，心里一阵酸，可是忍住了眼泪。后来北大十几位朋友邀我们小叙，我喝多了白干，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你，就放声而哭，自己不能控制。为你，就哭了这么一次。我还没有去万安公墓，秋凉时候总得去看一看。

乍看，语调是平实的，交待事实，毫无“谬托知己”之迹，然而这样的文章却只有知朱先生最深，爱朱先生最切，同时又具有散文大手笔的叶圣陶才能写出来。

三是从内容看主要是谈论文学艺术和文化问题，在形式上也以议论性笔调为主，近似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文艺随笔”。但是这些作品具有两方面的价值：除了其文笔精致、逻辑严密、文艺观和文化观也有独到的见解外，同时又反映了作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的斗争业绩。

例如，叶圣陶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发起人之一，在《文艺谈·二十六》和《诗的泉源》等文中，显然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精辟地阐述了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

术”的主张；叶圣陶在反击“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中一马当先，而《侮辱人们的人》等文则是这一斗争的实录；在二三十年代文艺界文化界泛起“尊孔读经”反动逆流的时候，进步人士纷起反击，叶圣陶的《国故研究者》和《读经》等文，又不啻为重磅炸弹。试看《读经》一文说：

青年的心性太活跃了，自由探索的勇气犹如不羁的马。给他们以有形的束缚，他们会跳起来闹什么风潮。给他们以无形的桎梏，让他们的心思才力慢慢地腐败下去，这才不至于出什么乱子。于是那些人的权势得以稳固，天下得以太平，秦始皇所梦想的，他们得以亲身经历。此所以在如今时代，青年又将有“读经”的福分。

这段亦庄亦谐的话，深刻地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反动统治当局把助长某种反动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无形的桎梏”，对于人民群众的心灵摧残和毒害，远比政治上的高压手段（“有形的束缚”）厉害得多；而且，反动统治者向知识分子套下以“读经”为形态的“无形的桎梏”，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实是一把利刀的两刃。显然，如此犀利的揭露批判，足以令青年们警醒，也足以令反动统治者胆寒。

值得一提的还有《文章病院·第二号病患者》。这篇绝妙之作虽然是从纯技术性角度指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在语法逻辑修辞上的错误，但每个读者显然都能够从中听出弦外之音而发出会心的微笑。

四是序跋性文字，其中既有为自己的作品集写的序跋题记，也有为他人的著述撰写的序言，还有为自己编辑的